

刺杀三巨头

[匈]拉斯洛·哈瓦斯 著

朱志顺 译

引 言

德黑兰 一九四三年

波斯人为什么不选别的地方而偏偏选在这个永远缺水、且为恶劣的大陆性气候所控制的地点建都，至少有两大重要的原因。

即使在将距城二十五英里的一条小河之水引到该城之后，供水状况依然很差。炎热的夏天，首都的居民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地下室里避暑，而在隆冬，由于缺乏应有的供暖，同样只能躲在地下。

不过，应当承认，当地居民就是在地面上也不很勤劳。如果相信统计数字，那么城市居民的百分之五十是游手好闲的懒汉、乞丐和刑事犯，百分之二十五是商人、职员和专家，百分之二十是各种手艺人，只有百分之五是工人，而且对工作也并不怎么热心。

然而就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当地居民中能读会写的人数却高得让人吃惊。与全国其他地区不同，德黑兰有半数居民是有文化的。

尽管不能将两类指标进行直接类比，可我们仍然要说，吸鸦片的人大都是文盲，每两个文盲就有一个吸鸦片。伊朗全国



有百分之二十的人靠种植罂粟为生。伊朗鸦片品质上乘,吗啡含量达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三,而中国的鸦片吗啡含量约为百分之七到八。

德黑兰还有其他值得自豪的东西。四十年代旅游类出版物中说到,德黑兰家家都通电,伊朗很多城市建有数量充足的旅馆,自助餐馆中有音乐助兴,放映有声电影。不过,只有豪华宾馆里有供暖、热水和冷水。

街上的交通也较为方便。高级警官乘坐双层公共汽车,普通大众也有马拉的胶皮轮大车作为交通工具。高官、大地主和大商人一般拥有私人轿车。

一九四三年德黑兰的人口约有七十万,这个数字可能有几百上下的误差,但我们不想费力去搞一个精确的数字。统计学在此无济于事,因为来来往往的流动人口很多,绝不可能清查准确的

情况。一九四一年八月,俄罗斯人占领了伊朗北部地区,英国人占领了伊朗南部,伊朗人对于大量外国人的涌入开始司空见惯,毫不介意。首都的大街上有人说英语,有人说法语、俄语、土耳其语、波兰语,对此任何人都视若无睹。

德黑兰的南部城区街道逼仄、弯曲,居住在这里的主要是工人、乞丐、手艺人 and 受雇用的杀手。北部城区街道宽阔,两旁是一层和两层的房屋,颇像十九世纪俄国的外省城市。

德黑兰是一个从来都不会特别引人注目的城市,但是此时的伊朗统治者礼萨沙·巴列维却将它变成了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

幸亏国王巴列维的财力和精力在城市改造计划中统统耗尽,使他未能涉足城市南部的穷人区。然而,为了好歹弥补一下失败,他彻底摧毁了居民住宅区的东方风格,建设了一个新的城



市,但这个城市的建筑风格绝对不能算是西方风格。

包括军人和文人在内的外国人对这个城市的“繁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的两年时间内,他们使城市的物价指数提高了百分之五百。一套不带家具设备的住房的年租金为两千至两千五百美元。一磅黄油的价格为四美元,黑市上一个橙子卖到二十五美分。一架旧打字机的价格在两百到三百美元间,一辆美国产的旧轿车甚至要卖一万美元。

没有人会埋怨,因为买不起的可以去偷。政府官员有稳定的工资收入。部长的工资略高于一辆旧轿车的价钱。警察的身价与摔跤手、官方雇用的杀手相仿。外国人只能与现实妥协,他们的仆人外出购物,主人要付给购物总价的百分之二十的津贴,此时如果仆人还要欺骗主人,主人才能抱怨几句。要找个称职的仆人十分困难,当地的贵族和外国人总是从波兰难民中雇用仆人。十二万波兰人从苏联来到德黑兰,他们的到来加剧了这里本来就存在的混乱。

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民族在德黑兰都有自己的代表。没有任何人关心,为什么安特卫普的珠宝匠会到铁路工地上当施工员,为什么澳大利亚牧场主的寡妻会在德黑兰开妓院,为什么芬兰的化学家和律师从洛杉矶跑来贩卖鸦片,而且占有伊朗鸦片贸易的很大份额。

各占领当局宣布,每天晚上十时以后任何人都不得外出。伊朗的警察受命监督严格执行戒严时间。只有持特别通行证的人员可以在戒严时间外出,如果违犯这些规则,警察就要收取高得难以承受的罚款。

德黑兰的街道与乡间的道路同样“安全”。一九四二年宪兵方面自豪地宣布,只有三分之一的运输车队遭到了袭击和抢劫。



为了保证经由伊朗领土向俄罗斯运送军事技术装备的安全,美国调来三万人的军队支援俄罗斯和不列颠的军队。美国驻德黑兰大使路易斯·德雷福斯为处理对他的同胞的投诉而忙得不亦乐乎。据当地居民说,隶属波斯湾司令部的部队的士兵只会一味酗酒、斗殴,开车压死儿童,强奸当地美丽的姑娘。

尽管如此,对英国人和俄罗斯人的仇恨并未扩大到美国人身上。昆廷·雷诺兹在其《铁幕升起》一书中得意地指出:“伊朗仇恨英国人,害怕俄罗斯人,但容忍我们。”

对美国人强烈的仇恨是因为面对美帝国主义的贪婪胃口为自己的独立担忧;仇恨俄罗斯是俄罗斯的扩张主义,俄罗斯抢走了伊朗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及另外几个行省。

在二十世纪初,英国人和俄罗斯人达成了“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现在德黑兰的大街小巷还流行着有关此事的讽刺歌谣:

听说俄罗斯和英格兰,
今年再一次结成同盟……
就像猫和老鼠签订和约,
遭殃的是食品杂货店老板。

德黑兰在一九四三年外交上仍然是中立城市。英国军队临时进入这个国家的首都是为了镇压反饥饿的游行示威。市内的和平与秩序由英美两国的军事警察和当地警察共同维持。

德黑兰警察局的顾问是一个美军上校,名叫斯蒂文·蒂默曼。因抓获拐骗儿童查尔斯·林德贝尔格的罪犯而闻名的诺尔曼·施瓦茨柯普夫上校现在负责改组伊朗的宪兵。此外,两个上校开始摸索着处理贫穷、贪污、抢劫、卖淫、毒品买卖、黑市交



易等问题,其行动的规模是空前的。

伊朗人为自己国家的前途担忧,而已经适应专制制度的外国人只能与现状妥协。在大战结束以前德黑兰要爬出犯罪和贫穷的泥潭看来已经没有希望。这个城市什么都不可能发生了,因为所能发生的一切都已经发生。

然而一九四三年,在二次大战的第四年,德黑兰却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此前许许多多国家的人们对德黑兰一无所知,现在却开始谈论德黑兰。

数百名外国人来到了这个都城,其中有像温斯顿·丘吉尔及其私人侦探汤姆森这样的英国人,有女大学生万达·波拉克和语言教师伊达·科瓦尔斯卡这样的波兰人,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新闻记者彼得·弗格森这样的美国人,有法学家温弗里德·奥贝格和拳击手洛塔尔·舍拉霍恩这样的德国人,有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代表安德烈·维尔津斯基这样的俄国人。

这些人中有些是来与另一些人会晤的,有些是来实施谋杀活动的,还有一些是来制止谋杀活动的。

此前他们相互是否相识,他们是否知道对方的存在,这都很难说,但是这些人的命运互相交织,现在每个人的命运与他人的命运互相依存,息息相关。由于某些人手中掌握着全人类的命运,因此这场戏剧所有参演者的行动都对全人类的命运产生了影响。

这些人都是什么人,他们生活在什么世界,他们在什么时间、为了什么目的、如何来到德黑兰,他们在德黑兰都干了些什么,下边就来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部
谁是罪犯？ 犯罪事实？
犯罪地点？ ……

一 月

“如果谁能给我五十个人！五十人，这是我的全部要求！不是五百万，不是五百人。只要五十人，一星期之后一切全都解决。”

约瑟夫·施纳贝尔对教授这种脱口而出的高谈阔论已经听惯了。党卫军少校鲁道夫·冯·霍尔滕-普夫卢格不满足只能在上课时说说自己的理论。他常常选一位得意门生，将他叫到旁边，向他说明，如果他能得到充分的行动自由，他如何很快就赢得战争。

“我们既有胜利，也有失败。我们攻占了大片的土地，现在我们必须用庞大的军队来防守这片土地。可是目的何在？要是我们最终能获得胜利，这很好，可是我们为此要花费多少时间，要牺牲几百万德国人的生命？”

青年施纳贝尔是汉堡阿尔顿间谍学校的骄傲，他知道讨论将会得出的结果。老师的理论已经有了明晰的轮廓。

“我们不可能迫使俄罗斯人兵力枯竭。他们前赴后继，打死一人，又上来两人。我们何必要为难自己去杀害普通士兵呢？他们不过是炮灰，不过是执行命令。”

老师像往常一样，接着回答自己的问题：“五十人！我只要五十人。五十个才能卓越、信仰坚定的人。这些人英勇无畏，懂



得如何潜入要害之地,亦即发出命令之地,那就是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小手枪射出的一颗小小的子弹的功效甚至大于整整一个炮兵团。要是斯大林没了,普通俄罗斯士兵还能干成什么?你以为他还能继续战斗?”

他的学生施纳贝尔听得津津有味,不过仍大胆地表示异议:

“少校先生,照您这么说,那边上层的人物全都是不可替代的了?您认为,如果丘吉尔或罗斯福死了,就没有人接替他们的职位了?那您认为那些将军会怎么样呢?说到底是在进行真正的战争。”

鲁道夫·冯·霍尔滕-普夫卢格早已料到学生会提这个问题,说:“将军?别逗我了!他们那些将军不比我们的将军强。他们保养得好好的,在司令部里无所事事,只知道一个劲儿地打牌。你什么时候在真正的战场上见到过将军?”

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早晨,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的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将军接到顿河方面军司令员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最后通牒。在这份最后通牒中,除了表明苏军十分清楚地知道保卢斯的艰难处境之外,别无新的内容。俄罗斯人知道,他已彻底被围,所有交通线都已切断,他的军队正在挨饿,没有御寒的冬装,援兵和后续供给都已无望。

俄罗斯人提出的条件完全如保卢斯所估计:为被俘官兵提供过得去的口粮,伤病员可以得到医疗救护,私人物品、等级标志、奖章予以保留。

保卢斯用电报将俄方最后通牒的内容转发给自己的总司令,请求给予“绝对行动自由”,但是希特勒知道,如果真给这位将军这种自由,他会如何行事。元首的答复简洁明了:“不!”

俄方最后通牒的最后期限为一月九日早晨。过了二十四小



时,俄军的五千门大炮即向仍然活着的德国军人开火,将其埋藏于城市的废墟之中。

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最后阶段开始了。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这一天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执政十周年纪念日,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在柏林广播电台发表讲话:

“第六集团军今天的斗争将载入史册。一千年以后德国人民仍将怀着景仰和赞美之情说起斯大林格勒会战,忆起德国军队排除万难在这里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在战争的紧急关头接到希特勒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命令的绝非仅仅保卢斯一人。

在北非,盟国军队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在阿莱曼顺利进行了进攻作战,并于十一月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登陆,隆美尔元帅收到元首发来的类似内容的电报:“战局要求阿莱曼阵地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兵一卒。绝不允许后退一厘米。不胜则死!”

如果有谁不能理解为什么德军士兵必须在毫无希望的战斗中死亡,那么希特勒在庆祝一九二三年慕尼黑“啤酒骚乱”十九周年的演说对此作出了解释:

“……但是他们把我视为敌人,这个敌人头脑中从来没有‘投降’这个词。我从小给自己定下规矩,这个规矩可能不好,但最终成为我的优点,那就是保留自己最终说话的权利。我们的敌人应该明白,如果说德国当时(一九一八年)无条件放下了武器,那么我原则上永远不会屈服。”

阿道夫·希特勒决心在各条战线不择手段地开展斗争,直到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一次会战不可能就赢得一场战争。很自然,希特勒信奉个



人在历史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这个原则——“元首原则”、“民族领袖”思想是他用以首先针对自身的,但是他毕竟同意这样的说法:任何一个民族的命运均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领导人。

因此,从肉体上消灭敌方的领导人乃是整个战略的组成部分。道德上的考虑不能制止希特勒个人的暴力。他经常引用鲁道夫一世的话:“不能按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进行战争和书写历史。”

他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学会了重视“直接介入”的意义。谋杀不能被认为只是危急关头使用的极端手段,它常常是达到目的最有效、简便和最合理的手段。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在世界上一切生活里的思想斗争中,无情果断地使用暴力,可以获得预期的结果。”

当他的敌人尚在自己家中,在德国境内,不在国外的時候,他公开表述了如何清除敌人的思想。一九二九年三月六日,希特勒在慕尼黑说:“谁没有力量将刀捅进敌人的心脏,谁就不能领导民族。”稍后,在三月十五日,他说:“人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他们想活着,就得互相残杀。”

希特勒的同党不仅赞同他的思想,而且竭尽所能将其变为现实。在大战开始之前到希特勒彻底失败,第三帝国的上层领导人始终致力于不冒生命危险而消灭自己的敌人。

这些“高级的日耳曼种族的主要代表人物”一直在研究和检验包括水井投毒、打黑枪、抢劫和伏击在内的各种各样破坏活动的方法。

一九三九年大战开始后,党卫军和德国警察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就在思考如何毋需作战就击败敌人。

该年十一月,党卫军首脑希姆莱及其副官突然造访泰格尔,



德国军事间谍和反间谍机构阿勃韦尔的各大技术实验室就设在该地。阿勃韦尔隶属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这个机构实际上很少关心反间谍,它的主要职责是与间谍和破坏活动(在国外进行暗中破坏,暗杀,实施政治阴谋)有关的工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正式成立合法的间谍机关,这种机关如果不起一个纯洁无瑕的名称作掩护,至少也要起名为“反间谍机构”。阿勃韦尔共设三个处:第一处的任务是在国外从事全面的间谍活动;第二处的任务是领导在敌国全境或后方实施破坏和恐怖活动,组织暗杀和执行特别任务;第三处的任务是反间谍。

希姆莱在泰格尔请技术人员向他介绍间谍使用的各种武器,接着他提出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个人使用的武器,它可以大规模地歼灭敌人?

既然不存在这样的武器,那么希姆莱有一个具体的计划可以弥补这一缺失。如果阿勃韦尔向法国派遣足够数量的间谍,那么就可以在供战场上法国军队喝的酒里下毒,这样就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夺取马其诺防线。

如果瓦尔特·施伦堡^①能够完成由希特勒提出、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交给的任务,那么英国也可以不战而得。多么需要军事冲突啊,如果德国人有一个任何一位英国人都不能视若无睹的借口该有多好,可这是英国的国王,他反对战争,是德国人民的朋友,是希特勒崇拜的人。

法国军事失败后,温莎公爵(原为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为

^① 瓦尔特·施伦堡(1910—1952),党卫军将军,自一九四一年至第三帝国覆亡期间担任帝国安全总局第六局局长。该局任务是在国外组织间谍活动,实施破坏和恐怖行动。帝国安全总局隶属党卫军首脑希姆莱,帝国安全总局还设有包括“克里保”(刑事警察)和“盖世太保”(国家秘密警察)在内的单位。



娶心爱的女子而于一九三六年放弃王位,被授予温莎公爵称号)作为英国军事使团的成员先出使西班牙,再从西班牙到达葡萄牙。他不得不从葡萄牙启程去巴哈马,他被任命为巴哈马总督;英国王室不愿意昔日的君主继续留在欧洲,他会使英国蒙羞。

国王浪漫的婚姻和放弃王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的名望和声誉,因此希特勒现在坚信,如果他能说服这位温莎公爵来德国,并且在电台上向英国民众发表演说,那么他在反英宣传攻势中就握有一件价值无量的武器。希特勒相信,温莎公爵和夫人正盼望为德国的事业效力,尤其是他准备为公爵夫妇提供五千万瑞士法郎,使他俩能过上“与其爵位相称的”生活。

施伦堡抱着“解救”公爵的目的出发前往里斯本。按里宾特洛甫的说法,谈的就是“解救”,因温莎夫妇现在是被流放,实际上是英国间谍机关手中的人质。不过,预先也作了考虑:如果公爵不愿听从德国的劝告,那也必须被“解救”,不管他本人是否愿意。

施伦堡来到葡萄牙的首都,与当地的德国间谍取得联系。他很快就知道,公爵夫妇居住的房子不光有英国特工人员的严密监视,而且还有数十名葡萄牙警察守卫,要想劫持谈何容易。由于缺少足够的间谍,他本人不能参与此次行动,再说他接到过希特勒要求特别谨慎的命令。此外,施伦堡手下虽有数千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但面对直接危险他却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为了逃避这次任务,施伦堡向柏林发了一份紧急报告,详尽叙述了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他的花言巧语蒙蔽了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将行动的准备情况向希特勒作了报告,他自己对发生的事情也无把握。不过,施伦堡的说明似乎是合理的,他回到柏林后,里宾特洛甫对他说:“元首很重视您最后一份电报,并



让转告您,他尽管对事情的整个结局不满意,但是同意您的决断,赞扬您的行动。”

一九四〇年年底,希特勒给情报机构下达了新的任务。

德军总参谋部担心法国军队最卓越的军官之一魏刚·马克西姆将军利用北非的法军部队,在北非组织抵抗中心。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完全赞同希特勒的意见:最好赶在魏刚组建成功一支由他指挥的军队之前,将他从肉体上消灭。

消灭魏刚将军的任务交给了拉豪森将军。他是组织破坏和谋杀的专家,毫无疑问,他应当得到信任。拉豪森是奥地利情报机构的组织者之一,早在德奥合并以前他就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因为他的功勋(也因为他出卖祖国),阿勃韦尔的首脑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任命他为自己的贴身顾问。

在当时要完成既定的任务是相当困难的。在北非刺杀魏刚很容易,可是希特勒要求德国人不参与行动,这就几乎不可能成功。

拉豪森把这些困难告诉凯特尔。与以往一样,希特勒有关这个计划的热情几天之后就消退了,得知这项行动有可能造成政治恶果,他就毫不可惜地放弃了刺杀魏刚的计划。各个战场的战争进行得很顺利,没有理由非要干预这项危险的行动。

当然,事情也不像拉豪森在纽伦堡审判时所供称的:“我对凯特尔说,我的人在学习作战。我们不是杀手,更不是受雇用的杀手!”其实拉豪森领导的处的正式任务就是“暗中破坏和谋杀”。

拉豪森与凯特尔之间发生所谓的“冲突”之后,继续在原先的职位上干了三年。他在纽伦堡审判时不仅是个证人,同时也为历史学家提供了有关阿勃韦尔的重要材料。他在制造有关卡



纳里斯的神话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加任何核实就接受了他的声明。

尽管拉豪森与凯特尔有矛盾,但两年后凯特尔仍将暗杀另一位法国将军的任务交给了他。

法国将军亨利·日罗从柯尼斯堡逃跑,取道法国去北非。希特勒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不过他仍抱希望,他的情报机构有能力阻止日罗离开欧洲,使他无法去北非组织法国抵抗部队。

与以往各次行动一样,为了顺利完成“古斯塔夫”行动,同时有若干组织参与其事。拉豪森知道,盖世太保已经接到消灭日罗的命令,他巴不得盖世太保的人取得成功。当然,他这样想并非出于道德上的考虑,而是因为他预见到这件事涉及的问题数不胜数。

日罗经由德国、法国逃亡的行动组织得极其周密。尽管阿勃韦尔和盖世太保一直跟踪追击,但他总能顺利脱身。在捷克游击队成功刺杀帝国安全总局(也即盖世太保)局长海德里希之后,疯狂的追击终于结束。

盖世太保是帝国安全总局的一个局,它只得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到捷克这个“保护国”。阿勃韦尔也急于干成同一件事。

希特勒大发雷霆,不过他和其他纳粹头目也开始明白政治谋杀的意义:现在没有人感到自己是安全的。然而,他们现在不去消灭某个敌方的领导人,而是决定屠杀捷克利迪策村的全体居民。

日罗将军长时间滞留于法国,再次让德国领导人担忧。希特勒的幕僚,尤其是里宾特洛甫和戈培尔,一向不相信贝当元帅。希特勒赞同他们的看法。得知日罗抵达法国,希特勒即派



奥托·斯科尔采尼(后任破坏恐怖局头目)去维希^①。

希特勒不排除贝当跟随日罗离开法国去北非的可能性,一旦发现贝当有这一企图,斯科尔采尼必须立即逮捕贝当这个法国政府首脑,并将其押到德国。

奥托·斯科尔采尼率党卫军分子在等待贝当的行动。日罗离开法国去北非后,贝当仍然留在法国,危险看来已经消除。希姆莱对于日罗将军的家属已被逮捕感到很满意。

直到大战结束之前,希姆莱和施伦堡对于暗杀和绑架敌国将军始终不能释怀。甚至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他们意识到德国军队难以阻挡敌军的推进时,他们依然计划通过刺杀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来扭转事件的进程。

除了这些经常产生却往往无法实施的计划以外,他们还一连数月细细准备被他们称为“跳马”的行动,旨在消灭铁托元帅的司令部,刺杀或抓捕南斯拉夫游击队的领导人。这个行动的代号取之于象棋术语。

在准备阶段,一切都显得那样诱人。希姆莱手下的间谍汉斯·黑尔姆于一九四三年元旦前夕查明了铁托的数个化名。

黑尔姆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致希姆莱的信中报告:“机械师约瑟普·布罗兹是克罗地亚起义者的领导人,他就是伊万·康斯坦涅谢克工程师,他也是斯拉夫科·巴维奇工程师,他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

德国人悬赏十万马克买铁托的脑袋,可是一直没有结果。后来阿勃韦尔和安全总局接到命令,详细制订“每个步骤都要加强联络、密切合作”的计划,在进攻游击队司令部的同时,派伞兵部队抓捕铁托。

^① 法国中部城市,贝当附敌政府所在地。



此次行动定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是铁托的生日。希姆莱估计,游击队员们在铁托生日这一天会大量喝酒,这样就增加了进攻行动的突然性。有人问他,他计划将谁作为牺牲品,他回答:“罪犯、外国人和狗。”

施伦堡不像希姆莱那样乐观,尤其是在查明铁托的司令部驻在波斯尼亚的小城德瓦尔这个情况之后。施伦堡研究了地图,得出结论:突然袭击将成为自杀。

CC-501 大队由从监狱和集中营释放的清一色的刑事犯组成。全大队八百人都是训练有素的精壮。然而事出所料,当他们伞降至德瓦尔城郊时,迎面遇见的不是游击队,而是手握斧头、镰刀的农民,他们此时只有一个愿望:赶快拔腿逃跑。

德国空军和飞机徒然在萨格勒布等待,这架飞机原来是要把活着的游击队领导人押回柏林审问,然后再送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那里已经为他准备了“别墅”,布吕姆^①和舒施尼格^②就住在这个“别墅”里。

“直接行动”再度失败。瓦尔特·施伦堡苦涩地说:“我们并未获胜,不得不以缴获到一套新元帅服而聊以自慰。”当然,他是不会为失败负责的:“军队和情报机构应当一起工作,可是希特勒又发出了平行指令……”

尽管局势变幻莫测,但奥托·斯科尔采尼在布达佩斯却较为幸运。

希特勒一向不很信赖匈牙利摄政者米克洛什·霍尔蒂,他

① 布吕姆(1872—1950),法国社会党领袖,对法西斯侵略者实行“绥靖”政策,后被法西斯逮捕,囚禁在德国集中营里。

② 舒施尼格(1897—1977),奥地利总理,德国合并奥地利后,他被捕,囚禁在德国集中营里。